

· 美国文学史论译丛 ·

VIRGIN 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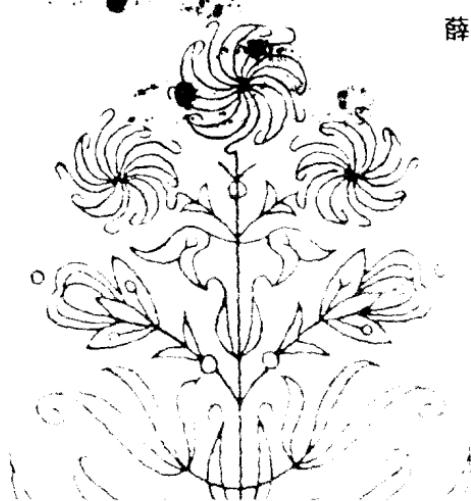
处女地

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

[美] HENRY NASH SMITH 著

薛蕃康 费翰章 译

薛蕃康 校订



处女地

——作为象征与神话的美国西部

薛蕃康 费翰章 译 薛蕃康 校订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学院内)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11.125 印张 11 插页 277 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81009—637—0/I·044

定价：6.40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亨利·纳什·史密斯对“作为象征与神话的美国西部”的研究为美国文学史提供了一个较少明显政治色彩的主题。西方大多数早期评论家认为本书对古典美国文学的研究作出了永久性的贡献。特别是作者对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方面的解释，是对美国历史的解释的重要转变。

诚然，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研究的结论常为文学评论家应用于他们的主题的分析方法所左右。而本书作者对西部文学的研究仍沿着神话批评和语言学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方向进行着，成为这一领域之先驱。他对西部文学和大众文化的研究影响着学者的思想意识。

本书对研究近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人员、高校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系美国匹茨堡大学英语系教授、文学博士迈克尔·赫尔方 (Michaels Helfand) 于1979年夏至1980年夏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期间推荐翻译出版的《美国文学史论译丛》之一，他为本丛书各书中译本的出版撰写了序言。《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已列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科研项目。

一九九〇年六月



戴德伍德·迪克在拍卖中买进萨拉曼德·萨姆的女儿(1880年)



卢·德纳带领伊迪丝·萨德伯里避往安全地带(1862年)



移民的堪萨斯之梦(1873年)



科拉·里克特被印第安人劫持(1864年)



女匪号性的埃德娜(1873年)



侦探皇后丹佛·多尔(1882年)

中译本序言

亨利·纳什·史密斯的《处女地》在1950年出版时，就得到一般读者及学术界的好评。大多数早期评论家立即认识到该书对古典美国文学的研究作出了永久性的贡献。同时，它代表对美国历史的解释的一次重要转变，特别是在理解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方面。当强大的保守反动力量已经开始反对以前占主导地位的进步政治日常议题时，史密斯对“作为象征与神话的美国西部”的研究，为文学史提供了一个较少明显政治色彩的主题；同时，它通过对大众和民间文化的评价和研究，继续作出进步的努力以对民主的美国文化遗产作出解释。

1979年，一位美国西部（史密斯称之为“边疆之外的渺无人烟的大陆”^①）的历史学家写道，“自《处女地》出版以来，它比任何其他著述对学习西部文学的学生起了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对那些在美国学或大众文化系接受训练的学生是如此。”^②这一表述说明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有历史意义的要素，它们都和史密斯的研究相关。第一个是他把西部解释为一个神话所造成的影响，第二个是此书形成了有关美国学和大众文化的创新的学说，这一点具有基本的重要性。

① 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坎布里奇，马塞诸塞斯，1970），译本第4页。

② 理查德·W·伊图莱恩，《西部小说与历史：一次再思考》，载《美国西部：新的展望，新的内容》，杰罗姆·D·斯蒂芬编（诺门，1979），第154页。

史密斯对西部所作的解释的重要性已经被本书的最初评论家之一所认识，他就是小说家与历史学家A·B·格思里，他形容本书“对人们熟知的由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他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所开辟的领域作出了永久性的贡献。”^①事实上，在我们了解了《处女地》和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学说”——的关系以后，我们就会更理解本书的意义和重要性。

特纳是位历史学家，他在1893年曾提出，西部边疆对美国社会和政治机构以及美国国民性的发展形成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他写道，

美国各种制度的特点是，它们被迫去适应正在逐渐扩大的人民间出现的变化，以及横跨整个大陆时产生的变化。在横跨大陆的过程中，人们征服了蛮荒之地，并把这一进程中的每一个地区从边疆地区的原始经济和政治状态发展成为复杂的城市生活。^②

特纳认为，首批到达北美东海岸的移民者建立了基本上是欧洲的文明。这一文明逐步向西推移进入被认为是自由地的地区，产生了不同时期的边疆。在这些边疆地区，文化与自然——特纳称之为“文明”与“野蛮”，两相汇合。在这些汇合中，不同的环境逐渐地将各种欧洲文化转变为真正的美国文化与特性。

特纳相信，这一边疆经验创造了独特的美国精神品质：“那种与敏锐和好奇结合在一起的粗犷和力量，那种务实的、富于创造和敏于发现权宜之计的性格；那种擅长掌握实际事务而短于艺术，但能有力地达到伟大目标的特性；那种不知休止的紧张精力；那种主宰一切、为作好作歹而奋斗的个人主义；还有随着自由俱来

① A·B·格思里，《纽约时报书评》，1950年4月2日，第7页。

②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载于《重读美国》，加里·科伦坡，罗伯特·卡伦，邦尼·莱尔合编（纽约，1989），第21页。

的开朗活泼与勃勃生气”(特纳，上引文)。这些特性(以及政治价值)涌现出来并得到确认，因为“每一个边疆的确提供了新的机会，逃出了过去的约束之门；同时提供了新鲜、信心和对旧社会的漠视，对旧社会诸多限制和观念的不耐心以及对它的教训的漠视……”(特纳，上引文)。总之，特纳对某些基本上是美国的性格特点和政治价值作了解释并常常称颂有加。对这些价值和态度(个人主义，民主，平等主义，机会均等，实用主义，乐观，对普通人的信任)特纳和一批进步的改革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抱有同样看法，这些人对本世纪头50年美国进步的政治和文化目标的形成曾起过作用。

在《处女地》的最后一章中史密斯写道，“特纳的学说对美国历史是否作出了正确的解释，本书无意加以论证。这里的问题是将他的主要观点与前面各章曾经探讨过的理性传统联系起来”。史密斯的论点是，特纳对美国历史的解释乃根源于他所说的“花园神话”和“帝国神话”。本书的大部分就是专注于描述这两种神话和与之相关的象征——西部英雄在严肃文学、各种通俗文学、传记和历史中的表现。

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理解史密斯所说的“神话”与“象征”的意义，因为它们是他的分析的基础。他写道，“这两个词我是用来表示较大或较小单位的同一类事物，即指一种将概念与情感熔化为形象的理智结构。我所谈及的神话与象征还有一个特点，即它们是集体的表现而不是某一个别心灵的产物，同时我曾试图表明，它们有时对实际事务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处女地》第一版前言)。他所研究的两个神话，边疆神话和花园神话，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美利坚帝国的特性是……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被认为总是幸运的”(《处女地》第十七章)。就是说，根据这两个神话，美国人和他们西进时所遭遇的与定居的环境被假定为不包含根本的缺陷或弊害特性。这一神话告诉人们，在美国人

民投身的边疆，他们受到自然极大的影响，他们创造了小小的农业社区，这是美国人集体想象中的一个乌托邦。大自然和自然界万物是好的，而文明，特别是城市的文明，美国东海岸和欧洲（如果不指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是腐败的或正在变得腐败。这一好的自然和坏的文明之间的对立对理解这些美利坚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是极端重要的。不幸，对文化历史学家来说，情况不是如此简单，因为美国人对文明的确带有一种矛盾心理，有时贬低它的价值，有时则又看重它。

史密斯将本书三部分中的第一部分用来论述帝国神话。这是一种信念，即美国人只有依靠开发、定居和发展西部的土地才能履行天命。这一神话不过是欧洲人想找到通往印度和亚洲其它地区之路的旧梦的延伸，但它和英国发展殖民地的计划是不同的，英国的计划着重开拓沿海地区，以为一个以贸易为基础的海洋帝国服务。

甚至当殖民时期，象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人虽然主要关心的是北美大陆，也把西部农业的发展看作是最佳行动方针。他出了一些小册子，提出以从事农业为主的向西部移民将为未来提供大部分美国的发展与企业。富兰克林正确地想象，将来美利坚合众国的人口将以如此一种速率增长，使得向西部自由土地扩展不仅有利可图而且是必需的。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也和某些人同样怀有美利坚帝国的想法，这个帝国基本上是农业的，并且自给自足，逐步向西展移。他决定从法国手中购买辽阔的路易斯安那土地和派遣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去寻找一条商业上可用的通向太平洋西北角的水道（这又是“通向印度之路”的旧梦），其动机也是出于这一想象；当然，它实际上也使得美国人能在1840年代后期在靠近太平洋的地区建立农业社区。在19世纪时，这一神话以“天命说”为人们所熟知，它证明通过冲突、条约或购买而兼并大片土地是有理由的，这些土地已成为今

曰大陆美国的一部分。

当然“天命说”也被用来证明美利坚帝国向太平洋和亚洲的扩张是有理的，但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瓦尔特·惠特曼相信通向西部的旅程最终将是回归到全人类的精神之家。在他的最佳的诗篇之一“通向印度之路”中，惠特曼肯定人类的团结与各种族和各民族的兄弟情谊。史密斯说，“人们感激诗人想象中的‘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处女地》，第四章）。但是，当美国人后来回到孤立主义或主张民族自决的外交政策时，惠特曼的这一肯定并不能把“命定说”从它罪有应得的坏名声中挽救出来。

如果帝国神话鼓动了向西部的扩张，则花园神话助长了普通人把西部看作是土地肥沃、果实丰盛和自给自足的农业乌托邦的梦想，是“自由民社会的完满典型”（《处女地》，第十五章）。在18世纪时杰斐逊曾议论道，只有在居民的大多数是住在实质上没有阶级和地理上统一的社会中的独立农民时，真正的民主才可能存在。至19世纪中叶时，这一农业神话对宅第法的通过是一个强有力推动力。这一法案规定政府对定居并耕种一块土地达5年的个人将授予土地：“宅第制度对西部最强大的吸引力……源于如下信念：它将通过法令制定……艰苦而有道德的自由民的农业乌托邦，这一乌托邦自从克雷夫科尔的时代以来即萦绕于写西部故事的作家的梦想之中”（《处女地》第十五章）。

那些实际上已移居西部并试图在那里定居的人很快就发现他们的现实和农业理想有很大差距。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以西的大部分土地都很干燥。有些地方气候严酷，不宜于耕作。小农们发现在经济上难以自给自足而得常依赖并受威胁于日益增长的工业经济（例如铁道、农用设备的制造厂等）和世界食品市场。

然而花园神话仍然紧紧抓住美国人的想象力，从而产生了一些混合的结果。这一神话过去鼓励并继续鼓励为小农民及小商人提供经济援助的社会政策。它也支持对民主的信念。特纳只不过

是下述信念的最有名的代言人：西部自由地是民主的训练场也是民主的保证。但当自由地不再存在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特纳的脑子里总是萦绕着这一问题。此外，花园神话使得美国人感觉到在道义上高于世界其它各国，即它内在的重心鼓励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

史密斯说，帝国神话与花园神话这两者构成了占主导地位的记叙文字，大多数美国人用以解释被称为西部的那块不明确的空间。但是神话的记叙文需要有主角，史密斯在《处女地》第二卷“莱瑟斯托金的儿子们”中告诉我们他们是谁，他们的起源和几个不同的人物。莱瑟斯托金是詹姆士·芬尼莫尔·库珀在《开拓者》、《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和《大草原》这些小说中创造的边疆英雄：“迄今为止莱瑟斯托金这一角色是横越大陆的民族冒险事业中最重要的一个象征”（《处女地》，第六章）。库珀的角色成了民族的象征，正因为他体现了共有的思想和感情模式，还因为他综合了自然与文明、自由与法律的对立。^①

在这几章中，史密斯讨论了主人公的几种表现，从真实的美国人如丹尼尔·布恩，基特·卡森，戴维·克罗克特和公牛比尔，科迪等人的通俗传记到流行小说（“一角小说”）和荒诞故事中的主人公如首批开垦边疆的山地人，林区人和牛仔等。在讨论这些人物时他特别提到这些象征性的主人公的性格的转变，他们逐渐演化以适应社会有关人、自然与文明概念的变迁。在后来的表现形式中，主人公不再象早期的主人公那样把自然看作上帝。他现在更自信，更少卑贱感，也不再模仿东部社会的礼貌举止。甚至在真实的人物传记中也出现了这种转变。因为如史密斯所解释的，“大众的想象经常根据神话的需要而改变向西部迁移的事实”（《处女地》，第十章）。结果象丹尼尔·布恩这样的人常常因

^①译者按：莱瑟斯托金亦被译作“皮袜子”。

为这种流行的对他们生活的歪曲描述而感到不满。不过，在所有情况下，这一象征性的主人公，象与他相关联的两个神话一样，必须去解决“自然的事物”与“文明的事物”之间、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常相冲突的价值观。对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自然的绅士”这一主题所衍生出来的不同的主人公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正式教育或适当的社会训练的人，但他体现了美国文化所有伦理的、实际的和社会的理想。小说常常能够创造出生活中不可能完成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称为小说，为什么它们能发挥很大的吸引力以及为什么它们成为史密斯所说的神话与象征。

本书对严肃文学与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作为象征和神话来研究，它们两者都体现了并有助于形成人民大众的意识以及历史事件的进程。正是这种分析模式使得本书作为历史研究及文学史具有新意和影响。史密斯特别使用的象征和神话的分析方法乃自多种学科发展而来，其中包括人类学、新文学批评家使用的文学批评、以及心理学和哲学。他对历史方面象征性结构的力量所作的研究增加了这门学科的深度。他对大众文化中的典型产物进行了象征的分析(这通常专用于严肃文学或艺术)并肯定大众文化和某些严肃艺术具有同样的功能，从而使文学研究大众化并成为新美国学、大众文化及跨学科专业等系科学生的一个模式。这些系科认识到大众和民间文化的重要性和价值，使得严肃地研究这些文化成为合法化了。

这本书也有其历史重要性，因为它代表一种反冲，反对那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学家的假定和实践。史密斯对特纳的“边疆学说”的分析可以说明这点。如我前面所提及，特纳对美国性格和美国机构及其制度的分析对本世纪前半期的进步政治和文化的讨论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进步文学史家如弗农·帕林顿等认为美国文化的主流是由重视民主特性与价值的作家所界定的，这些民主特性与价值和特纳解释的如果不完全相同也是相近的。他

也认为他的作用之一是用他的著作来促进那些进步的价值观，他的著作为有用的历史下了解释。

虽然史密斯不反对进步的价值观，也没有对特纳的学说的有效性直接提出挑战，但他确是使得支持进步议论的对美国历史的公正解释变得大大复杂了。例如，他说“边疆学说本身是从花园神话发展起来的，在有关支配过美国生活的经济力量问题上，它包含了某些错误的判断”（《处女地》，第二十二章）。他解释说，特纳的分析没有对美国历史上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力量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他提出，进步学者所说的有用的历史并不是那么有用。史密斯是许多反对过进步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如里查得·霍夫施塔特及莱昂内尔·特里林）中的一个，因为那些进步的学者为他们的政治理想服务而把历史过分简单化了。应当记住，这种反冲发生在冷战开始以后美国政治转向极端保守的高潮之中。因为这些理由，《处女地》在现代美国文学史的发展中是一个里程碑。这是由于它的学术贡献，也由于它的历史代表性。

自《处女地》出版后39年以来，有关西部文学已经做了很多重要工作，而这也代表了文化意识中专业的趋向与变化。1970年史密斯自己写了一篇前言，作了某些自我批评，主要是关于流行的神话与信念都是“对来自观察的事物的歪曲”的说法（《处女地》，20周年重印本前言）。他后来的信念是“在思想和它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而“人类从事于有目的的集体活动……不可能没有某些形象，这些形象既表达了集体的意愿，又同时对无量数和无限变化的经验事实起粘合作用”（《处女地》，20周年重印本前言）。十分简单，这意味着史密斯现在相信神话不仅表示愿望，它们实际上影响人类的知觉和对经验的解释，特别是就它们为理解和分析提供了某些范畴而言情况是如此。

在西部文学的研究方向上出现了另一个更根本的变化，这正

是因为对边疆神话所界说的一个范畴提出了挑战。由于美国印第安人(现在有时被称为土著美国人)进行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斗争而变得敏感起来的学者们已经承认西部和边疆并非无人居住的自由地，这片土地上原有的土著美国人文化既不是野蛮的也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一认识也导致人们接受土著美国人文化和历史是美国西部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这一看法。它也使得一些学者如理查得·德林农在他的著作《面向西部：憎恨印第安人与建立帝国的形而上学》(1980)中重新解释西部经历，提出白人文明在对待印第安人方面本质上是野蛮的。德林农论称，特纳把边疆界说为“野蛮和文明的汇合点”，以及他把印第安人的文化与野蛮联系起来，从而“清楚无误地影响了民族的暴力模式，因为它确定在适合的环境中一个人可以杀掉谁，由此便成为美国方式的处死的一个主要来源。”^①

自《处女地》问世以来，对西部及其文学的研究已大为增加。专门从事此项主题的期刊也先后出现，至今仍在出版，这肯定是学术界兴趣的一种表示。对西部特别是边疆进行历史的研究在两个方向发展。一派把美国的边疆解释为欧洲边疆的较晚的表现形式，从而提出美国不是由这一经历形成的仅有的文化。另一派则界说和分析美国不同形式的边疆(自然的，军事的，矿产的，农业的，裘皮猎取的，等等)，每一边疆创造了它本身的环境与经历。

有关西部的其他文学研究也有出现。这些研究表明特纳的神话仍然在现代美国的意识中占居统治地位，尽管它的分析引起疑问。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研究的结论受到文学评论家在他们的主题中所应用的分析方法的影响。如对有关西部文学的研究，理查德·埃图莱因最近曾指出：“当前的研究继续沿着神话批评和语

^① 引自乔恩·塔斯卡、维基·皮卡斯基及保尔·布兰丁编，《边疆经历：美国西部生活与文学的读者手册》(杰斐逊，北卡罗南纳，1984)，第5页。